

文艺片票房奇袭,别只盯着低评分

玉渊杂谭

崔爽

不知道29岁的导演毕赣日后会如何回想这大起大落的几天。刚刚过去的跨年夜,他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下简称《地球》)终于公映,票房两天2.75亿,问鼎元旦档亚军。在有人喊出“毕赣为艺术片逆天改命”的同时,争议如潮水般涌来,兴冲冲冲进戏院看汤唯的观众睡倒一片,出来就给这部“看不懂的大闷片”打了低分,甚至还有恶骂屏幕的传闻。

更大的舆论漩涡是对电影营销的质疑。如果说毕赣一战成名的《路边野餐》

是无心击出的漂亮水花,那《地球》绝对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票房奇袭。这是一个可以写进营销教科书的案例:团队以抖音作为宣发主阵地,在晦涩的作者电影中提炼出爱情片的浪漫,打出“一吻跨年”这张王牌。结果,大量明显不好这一口的抖音用户买了票,5000万投资顺利回本;代价也有,毕赣从天才导演成了“大忽悠”,还没登上神坛就下来了;同时电影遭遇“口碑反噬”,享受到了文艺片罕有的“被迫骂”的待遇。

恶意营销,这四个字和一部文艺片连在一起,可算蔚为奇观。毕竟文艺片导演们身上最著名的标签就是穷和真诚。但冷静下来想想,除了少数理性探讨影片成色的声音,《地球》挨的大多数骂都站不住脚。

首先是营销,电影是昂贵的造梦,拍第一部时的毕赣兜里没有请制片人吃饭的钱,满打满算花了十几万,惊人的40分钟长镜头简陋、粗糙、透着穷。他的困境与大量主流视野之外的新导演别无二致。但影片横空出世,国内外获奖无数,青年导演一跃成为新生代代表,再出手凑起16个出品方,合作一线演员。高投资带来高票房期待和压力,营销团队自然竭尽全力。

恶意更谈不上,宣发是再正常的不过的市场行为,观众连打着“爱情公寓”旗号拍盗墓片都能接受,文艺片找找角度无可厚非。更多观众喜欢当然好,真的被宣传误导也不恼火,吃惯了鸡鸭试鱼虾,实在不喜欢就算了。

从这轮口水战中,还显现出另外一点积极的意义。以往提到文艺片营销,总离不开制片人下跪、导演写文细数心酸,总之摆脱不了苦哈哈的联想。但在《地球》身上,文艺片不只有了商业片的票房,还有了商业片的班底。不再是导演悲情英雄式的单打独斗,而是体系化的团队作战,专业自有力量,值得同行效仿。

至于口碑争议,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吧。一来电影吸引了核心受众以外的观众,大家口味不同,自由评断。二来所谓的大众小众本来也不灵了,电影市场走到今天,不问商业艺术,只看好片烂片。去年票房最高的是现实主义的《我不是药神》,今年从《地球》起,欢迎更多闯入者,搅动电影这池水。

朱公谨和他的哥廷根学派风

科学史话

张晓磊



在我国现代科技史上,众多饱学之士为推动社会革新、科学进步以公心、呕心沥血。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尽管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但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我们要提到的便是其中之一。

他是中国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毕生致力于我国现代数学的教学和传播,他曾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并带头编写了《高等数学》教材,他还是我国偏微分方程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他,就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朱公谨。

1902年7月,朱公谨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书香之家。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后又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学院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27年,他凭借论文“关于某些类型的单变量函数方程解的存在性证明”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对变分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被学界认为是我国现代应用数学研究的最早文献。

哥廷根大学是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这里汇聚了数学巨匠高斯、黎曼、希尔伯特等人,他们形成的哥廷根学派在近代数学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朱公谨在哥廷根期间师从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大弟子柯朗,同时哥廷根学派重视数学教育、热衷数学普及等优良传统,也对年轻的朱公谨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学成回国后,朱公谨就职于当时的交通大学,并先后在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浙江大学师范学院等多所高等学府任教。在教学上,他秉承并发扬了苏格拉底的教学之法和自然科学之数学化的思想,倡导“推科学之本源,并教之以治学方

法”。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在灌输已有的知识,却在指示如何获得知识的途径。教师对于学生,除因势利导、唤起兴趣之外,必竭尽全力训练他思想的能力,破除他固有的成见,纠正他思路的错误,使他自动提出问题而自加以求解。注重思想实质的分析和思维的训练,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索,养成严谨、精炼、准确的科学习惯,正是朱公谨传授给学生的数学思想精髓。

朱公谨授课范围极广,讲授过微分方程、数论初步、解析几何、复变函数、投影几何、应用数学等许多数学课程。凡有听过朱公谨讲课的人,都无不对他高超的教学艺术赞叹不止。交大1946届毕业生钱钟彭在50多年后回忆起朱公谨的授课依然回味无穷:“有一次,朱公谨先生讲课,题目是偏微分方程的特殊解。他没有照一般地分成抛物线型、椭圆型、双曲线型那么讲,而是由边界条件出发指出可以用各种方法,如逐步逼近、变分法等手段达到目的,触类旁通,充分发挥,显示了‘条条道路都可以通向罗马’的妙谛。朱先生平时说话略有些口吃,但在课堂上讲课,不仅条理清晰,还口齿流利,滔滔不绝。我在听这次讲课时,如痴如迷,大有孙悟空在听菩提祖师说法时得闻大道的喜悦。”

朱公谨在普及现代数学知识方面成就斐然。中国数学会于1935年7月27日在上海成立,朱公谨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连任三届常务理事。中国数学会成立后,决定出两种刊物,一种是会刊《中国数学会学报》,另一种即《数学杂志》。《数学杂志》是以传播数学、普及数学知识为宗旨的期刊,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全国性的数学普及刊物自此诞生。朱公谨作为《数学杂志》的常务编委,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不仅负责杂志的征稿,还在《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数篇。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数学书多为外文原著。为更好地普及数学知识,朱公谨致力于翻译外文数学著作,如《代数精蕴》(连载3篇)、《数之意义》(连载3篇)。1937年上海沦陷,朱公谨特别翻译了他的导师柯朗的《微积分学教程》,并以此书表达爱国之情。除翻译外,他还写了很多高质量的通俗数学著作,如《变分学中之直接方法》(《数理逻辑》)、《数学认识之本源》(《数理逻辑》)、《苏格拉底讲学方法的应用》(《纪念黎曼》)等。

朱公谨为我国现代数学知识的传播及数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没有显赫的声名,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生诠释着对数学的热爱和对数学教育事业的执着。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

摄手作

希望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李娟摄

从历史中寻找教育之光

字里行间

赵文娜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民族苦难史,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着外侮内忧。然而与政治、经济局面大相径庭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语言文学等多个领域却呈现出一派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景象,涌现出一

大批大师名家。近日读了傅国涌老师主编的《过去的小学》,该书中收录了季羨林、周汝昌、梁实秋、柏杨、费孝通、丰子恺等42位大家对自己小学时代的回忆,从这些回忆中可以一窥当时教育的精华所在。

当时新式学堂的办学思想比较开明,注重学生知识的积累和兴趣的培养,更强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学习与生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壁垒,生活和社会就是大课堂。很多大师回忆起小学生活都提到了在校期间或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的情景。那种欢喜雀跃之情,正如季羨林先生所忆:“于时碧草如茵,嫩柳鹅黄,一片绿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们蹦蹦跳跳,快乐得像一群初春春江的小鸭,是我一生三万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语文课可以观察雨后初出的春笋,自然课可以到野外捕捉昆虫,地理课可以去山头上挖掘化石,美术课可以到溪水边写生山水,还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这还只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山镇小学的教学情景,更何况条件更好一些、教育理念更先进的学校呢?善于依托大自然、依托社

会资源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正如春风化雨,培养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精神,同时也保持着对生活对社会的一颗体察之心。

1920年,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小学各年级一律废除文言教科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相对于之前私塾教过的“四书五经”“之乎者也”,新鲜活泼的白话文让课堂变得有生气起来,尤其是国文课选取的课文充满生活气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小学第一册第四十课的课文是,“猫欢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虫一把米。羊欢喜,四面都是青草地。人欢喜,五个朋友在一起。”这种当时所谓被讥为“猫狗教育”的动物寓言、童话,却正合乎人性和教育规律。

那个时代的教师也大多具备着正直善良、宽容民主、学识渊博等特质,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品质对学生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北大教授龚祥瑞小学时因家贫而辍学,学校马校长多次登门恳求他母亲同意他继续升学,第四次来到他家

时,正赶上他母亲在后房灶间洗澡,马校长恭敬地守候在门口,最终感动了他的母亲。若不是这位三顾茅庐的校长,龚祥瑞的一生可能就要改写了。

在国家、民族屡遭变故时,小学教师们也并没有默不作声,而是以实际行动告诉学生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9年,叶圣陶先生与同学们跟随老师发表了《用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政府横暴摧残,务拂民情,吾三校忍无可忍,于六月十一日一致罢课,非特为对付日本之表示,做释放学生之要求,根本解决乃在满足民众之希望”。这,正是那个时代小学和小学教师的底气。

半个多世纪后,学校教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学设施、教学方法、教育资源等等不断走向丰富的同时,我们该如何坚守住教育的本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想,理想的教育绝不因固化为升学流水线上的道工序、一个环节,而应有着自身的独立价值,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熏陶与训练,是全方位的人的教育,是精神成人的起点。

为了造好药,他们“没有金刚钻也揽了瓷器活”

科海钩沉

张佳星

降压灵、降糖片、酞丁安……这些直指功效的药名,听起来似乎朴素极了。然而,除了镌刻其上的时代印记,它们的诞生还意味着我国的多个“第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缺血药是常态。为了走出这种窘迫,一批药物研究者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上走上了一条“淘金”“淘海”、借书誊抄、拆旧造新的科研之路。

在这些如今平均年龄已超过80岁的“药骨泰斗”们的努力下,不仅人民的基本用药需求得以满足,还推动着创新药物的研发。降压灵、降糖片、酞丁安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己研制生产的该领域品种,紫杉醇使得同类进口药品降价,麦角新碱则结束了中国妇产科用药的进口历史,人工麝香更是国内外首创,让名贵药材走进了万户千家。

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韩锐回忆,他

1956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学系研究生,1958年,根据卫生部的决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药理学系与中央研究院的药物系合并成立了药物研究所,一支药学研究队伍由此集结起来。研究所虽然成立了,却没有实体的工作场所,韩锐回忆,药物合成室就在一个小破平房里,还是借用的。平房里有心电图等简单的设备和一个手术台,大概就是这些“家当”。

1960年前后,研究工作需要用色谱仪。“那个时候要一个色谱仪可不得了,费了很多周折才搞到,全所只有一台。”韩锐说,而现在每个实验室都有色谱仪。

仪器的缺乏是当时药品研制工作中的一大瓶颈,而这些当年的小伙子需要克服的,还有特殊时期的身体生长的“瓶颈”。韩锐的记忆里定格了一个永不褪色的画面:一天,于技术员吃完早饭,对着墙自言自语“没吃饱”,而那时的他只有36公斤。

人家做组织培养用到的仪器挺好,但是从来没见过。”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前往美国的考察团成员,韩锐回忆,当时的中国并不富裕,外汇更是紧张,考察团每人每月只能有10美元津贴,刚刚够生活开销,但大家决定“凑钱也要买一个带回来”。回来后,考察团把凑钱买的仪器交给当时国防科工委下的一个工厂,要它们拆掉然后仿制,这样才得到了普及。“现在这个仪器很普遍了,每个药理实验室都有,坏了旧了扔了也很可惜,但回想起第一个的来历还是很感慨。”韩锐回忆说。

除了趁手的工具,先进的药理学理论知识也是当时的药物研究学界所匮乏的,学习是最好的追赶方法,为了让知识在国内迅速普及,前辈们借书誊抄,把阅读到的文献一一记录在文献卡片上。在最近举行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60周年纪念展览上,一个透明橱窗中就展出了几摞数百张的文献卡片。它们全部由有机化学家、药物化学家梁晓天院士手工誊抄,卡片的便签部分还写有核酸、乙烯等

中文标注,方便查阅。它们在所资料室里被翻阅多少次已无人知晓,卡片的磨损处无声地记录着知识接力棒的传承路径。在百张文献卡旁边,还放置着一摞摞条理清晰、有手绘图、有平直表格的手稿,他们是药理学家宋振玉的手稿,据说这是药物所研究员申竹芳从废纸堆里抢救回来的宝贝,她一直像照料老朋友一般“照料”它们,才把这位1937年就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的我国药物代谢研究事业开创者的笔记保留了下来。

古老的机械天平、上世纪50年代的原版电子秤,最早引进的半自动分析仪……在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指引下,当年的“药骨泰斗”们“没有金刚钻也揽了瓷器活”,他们从一字一页开始,从“一砖一瓦”起步,从“一仪一器”推动,开启了中国药学研究的新篇章,培养起了一支药物研究的科研队伍,也托起一个日渐蓬勃的药物研发和生产产业。而这一切提供不竭动力的,正是他们心念的人民能用上的放心好药。

紫禁城也有“报警神器”

博览荟

周乾

我们去故宫参观时,少不了看到许多监控探头,当然,这属于现代高科技报警系统。作为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从前的紫禁城有没有报警系统呢?

位于北京中轴线中心的紫禁城,安全保障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当有外敌入侵时,更需要有措施能及时发出战斗警报。人们所熟知的紫禁城报警信号有多种。比如,白天塔报报警。信炮修建在紫禁城西北侧的白塔山上,与紫禁城近在咫尺,只要接到紫禁城内出现危险的放炮令牌,炮手便会立即冲着天空开炮。驻扎在京城的卫士们听到炮响后,就会迅速集合,以及时抵御入侵的敌人。又如,紫禁城有腰牌与合符,上面刻有允许进入紫禁城的人员的身份信息。紫禁城四个大门的守护人员会及时检查出入紫禁城人员身上携带的上述身份信息,不符合者一律缉拿处理。

除了这几项常规的“安保手段”,其实,紫禁城内还有一种特殊的报警装置——石别拉。石别拉又名石海哨,是利用故宫常见的栏板的望柱头改造而成的。望柱也称栏柱,是中国古代建筑和桥梁栏板和栏板之间的短柱。普通的望柱望柱头,本质上就是一块瓷实的石头,不过要加工成用于报警的石别拉时,就要把望柱望柱头里面给挖空了,就如同一个空心葫芦。

据史料记载,顺治帝就命侍卫府在外朝、内廷各门安了不少“石别拉”,分内外前三围。需要报警时,将插入石孔内,三围的石别拉就先后被敲响。每当遇到外敌入侵、战事警报或是火灾时,守兵便用三寸长的小铜角(一种牛角状的喇叭)插入石别拉上的小孔,使劲吹响,铜角发出的声音会通过石别拉放大,发出“呜呜”的类似螺声的报警声,浑厚嘹亮的声音就会传遍整个紫禁城。

于是,这样一些并不起眼的跟故宫室外



的普通陈设很接近的石头,就构成了故宫紫禁城的报警网络。

清嘉庆时期,发生天理教人入侵紫禁城事件时,石别拉就派上用场。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正当嘉庆皇帝颞颥在热河秋狩之际,天理教安排各路教徒分别从东华门、西华门攻打紫禁城。此时,守卫在协和门区域的士兵吹响石别拉,紫禁城立刻启动报警。此后,宫里的火器营兵近千赶来,与教徒们展开了激战,并成功把天理教人剿灭。

紫禁城是我国古代宫廷建筑的精华,从建筑学角度看,紫禁城里的石别拉也有一定的特色。它巧妙地利用了紫禁城各个庭院内的栏板望柱头作为报警装置,兼具欣赏和实用的双重功能。一方面,这些望柱头形状和纹饰未受到改变,在紫禁城内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部分望柱头开孔,使之成为报警器,这些望柱头又起到实用性功能。它的应用,可以说是紫禁城建筑艺术与建筑智慧结合的一个典范。遗憾的是,尽管现在人们能够通过文献的考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但现在已没人能够把它吹响了。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